

七月的风暴

QIYUE DE FENGBAO

臧伯平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七月的风暴

吴伯华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

七月的风暴

臧伯平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唐山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4 1/8印张 2 插页 83,000字 印数：35,001—38,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2版

1981年6月第4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51 定价：0.35元

目 录

七月风暴之前.....	(1)
七月的风暴.....	(18)
铁窗内的斗争.....	(56)
追念我的战友——刘玉林同志.....	(95)
凤凰山前的红旗.....	(108)

七月风暴之前

打倒秦二爷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暑假，这期间在河北省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担任校长的是秦万瑞。秦万瑞身穿长袍马褂，嘴上留着两撇八字胡儿，白天在学校溜达几圈儿，晚上不是打开留声机听上几段京剧，就是到公安局打上半宿麻将。特别是因他对学生实行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对革命青年进行残酷的迫害，所以人们背后都叫他“秦二爷”。又因为他请的教员有些是反动、昏庸、无能的，就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

秦二爷，瞎胡闹，
打牌喝酒睡大觉。
教员请得真不孬——
多数都是大草包。

秦二爷只准国文教师给学生讲《诗经》、《礼记》，讲司马迁的《史记》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准学生读进步书刊，连鲁迅先生的作品都不许读，对郭沫若和蒋光慈的作品他更是视若洪水猛兽，不准任何学生过目。对这样的

校长，学生们哪能不反对呢！

当时，二师党组织的领导是侯喜全和赵天续两位同学，他俩与张锡彦、刘泽普等同学领导同学们提出了撤换草包教员和保证学生读书自由的要求，并选派代表和秦万瑞交涉此事。秦万瑞便大发雷霆，把学生们召集到大礼堂，骂同学们目无校纪，要求无理。并说背后一定有人操纵，学校要严加究查，谁要胡闹一定严惩不贷。说罢宣布散会，要同学们回去上课，不得再有非法活动。

侯喜全、赵天续、张锡彦、刘泽普同学把秦万瑞训斥学生的情况向我党保属特委作了汇报，并听取了领导意见。为打倒秦二爷，争取读书自由，二师党组织决定举行全校罢课，并派同学到北平召开各报馆记者座谈会，揭露秦万瑞的罪行，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同时向河北省教育厅递呈文，要求撤换校长秦万瑞。

罢课开始了，全校贴满了“打倒秦二爷”的标语，教员到教室一看空空如也，没有一个学生来听课，只好夹起课本回到自己宿舍睡大觉。秦万瑞气急败坏地跑到公安局，请来大批军警逼迫同学们到课堂上课，还妄想抓捕闹事的组织者。同学们看到军警来了，纷纷与军警进行抗争。侯喜全、赵天续代表全体学生向秦万瑞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请来的草包教员，讲课错误百出，误人子弟，应该撤换；二是取消一切限制读书自由的清规戒律，保证同学们自由阅读课外书刊；三是秦万瑞克扣学生伙食费，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侯喜全和赵天续提出以上三条要求后，接着对军警说：“我们罢课是有理由的……你们逼迫我们上课是办不到的！”

不撤换秦万瑞我们誓不复课！”同学们听到这里，一齐高呼口号：“打倒秦万瑞！”“争取读书自由！”“要求军警立即退出学校！”有些军警一听侯喜全和赵天续讲得有道理，都面面相觑，光站着，不动手。秦万瑞见军警不肯上前，气吁吁地跑到那个带队的警官面前，指着同学们说：“他们这都是造谣，是无理取闹，不要听信他们的胡说！”这位警官为了请功受奖，就冲着侯喜全和赵天续大声嚷道：“把他们俩抓起来，他们俩是闹事的头头！”军警闻听就上前抓人。一些同学一看军警要动手，一齐怒吼起来，接着就和扑上来的军警扭打成一团。另一部分同学直向秦万瑞奔去，包围了秦万瑞。同学们打算一旦军警逮捕了侯喜全和赵天续，他们就把秦万瑞抓起来做抵押。这位狡猾的秦二爷见势不好，拔腿就跑。警官和军警见秦万瑞先溜之乎也了，也不敢再和同学们扭打了，便纷纷后退，跟在秦万瑞的屁股后面溜出学校去了。

秦万瑞溜出学校，一面向河北省教育厅打电报，要教育厅批准他开除侯喜全、赵天续等二十三名同学，一面又与保定公安局的头子们密谋抓捕这一批同学。

学校的同学们也采取了两手来对付秦万瑞：一方面继续坚持罢课，提高警惕，准备应付各种斗争；另一方面又增派同学去北平报界揭露秦万瑞的暴行，并派人直接到河北省教育厅去告状。

秦万瑞终于买通了保定公安局的吴局长。他们知道大白天去学校抓人是抓不着的，于是想出一个恶毒的主意：派了一群化装成学生的军警夜间包抄学生宿舍，把侯喜全逮捕了，

同时，还逮捕了赵天续等十几名同学，并把侯喜全同学押送到天津高等法院。同学们得知以后，立即分两下行动，一部分到公安局要人，一部分包围了秦万瑞的卧室，要他向省教育厅呈辞职书，辞去校长职务，并叫他通知公安局放出被抓去的同学。

秦万瑞面目狰狞，两目凶光，八字胡不住地颤抖，用沙哑的嗓子叫道：“反了！反了！你们敢包围我的住房，逼我写辞职书，我要把你们统统开除！”同学们根本不理睬他的狂叫，警告他说：“你不叫公安局释放被捕的同学，不辞职，就休想离开你的卧室！”秦万瑞见同学们不买他的帐，就要开了野蛮，站起来要往外冲。但同学们早有准备，“咔嚓”一声就把他的屋门紧紧锁住了。秦万瑞冲不出去，立刻抓起电话筒给公安局挂电话，哪知电话却打不通。他没料到同学们把电话线也掐断了。这时他才无可奈何地倒在椅子上，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嘴里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

去北平的学生到了北平之后，马上召开了记者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记者有《世界日报》的、《大公报》的、《益世报》的、《晨报》的、《实报》的，甚至外国报纸驻北平的记者也参加了。学生代表向记者们陈述了秦万瑞不准学生阅读课外读物、克扣学生伙食费、串通公安局抓走学生的罪行，要求各报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向社会上报道这个消息。当然，这些报纸都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但在新闻记者中也有部分进步人士，愿意公布这种消息，特别是外国记者为了发新闻，赚稿费，也想趁机搞点名堂。所以记者座谈会开完之后，北平和天津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二师罢课、闹风潮

的消息，还报道了二师学生控诉秦万瑞罪行和到省教育厅告状的新闻。这些消息发表后，北平各大中学纷纷发来支持二师同学要求撤换秦万瑞的电报。由于这几方面的压力，河北省教育厅也怕把事情再闹大，会被争权夺势的反对派利用，所以考虑准备撤换秦万瑞。恰巧在这个时候，秦万瑞自己请求辞职的“辞职书”也送到了河北省教育厅，于是教育厅顺坡下驴把这位秦二爷给撤了。

秦万瑞为什么肯写辞职书呢？原来他被同学们关得受不了。起初他还凶气十足，不肯服输，没想到，不服输日子已经不好过了——想打电话打不通，想喝水也得向同学们说好话，想吃口饭也得向同学们写“申请”，昼夜不能出屋门，连大小便都被关在屋里。同学们又把北平、天津各报刊载的二师学生强烈要求他辞职的消息拿给他看，他感到事情不妙，因此不得已写了“辞职书”。

经过张锡彦、刘泽普带领同学们坚决斗争，秦二爷被打倒了，被捕的侯喜全等十几名同学终于被释放了，学校当局发出的开除二十三名同学的命令也宣布无效了，反对秦二爷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赶走张陈卿

秦二爷被打倒后，继任保定二师校长的是张陈卿。

张陈卿这个家伙比秦万瑞还反动，他是河北省教育厅长陈宝泉的亲信，他到校后首先安插了一个为他做帮凶的训育主任张渭滨。张渭滨是国民党中央分子，张陈卿把这个家

伙带来为的是与保定市国民党部和特种公安局相勾结，一起监视、镇压革命学生，以巩固他在二师的统治。在这同时，和二师斜对门的育德中学有个训育主任叫李涤之，保定私立同仁中学有个校长叫杨绳武，这两个反动家伙与张陈卿串通一气，互相配合，把持着学校，镇压学生革命，甘为国民党反动派效鹰犬之劳。

一九三〇年暑假后，由于我在河北第六师范的革命活动暴露，被校方勒令退学，后由党组织设法将我转入了保定二师，并把我的团关系转到保属团特委。我到二师后，在当时的团支部书记郭东明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有一次郭东明同志去育德中学活动，被训育主任李涤之发现并告诉了二师张渭滨。张渭滨立即和张陈卿宣布：郭东明散播共产主义，校方决定将其挂牌开除。郭东明同志被迫离开二师，去北平考入了中华中学，仍以读书为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郭东明同志走后，保属团特委通知我担任二师的团支部书记，不久又通知我兼任保定西关区团委书记。这样，我除了担任二师团的工作外，又和育德中学、河北大学附中、清苑师范、烈士田中学以及保定铁路工会的团支部有了组织关系。我们在二师出版了两种刊物：一种是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叫《曙前》，主导思想是利用文艺作品暴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地主资产阶级对广大工农群众的残酷压榨；另一种是秘密传阅的刊物，叫《破晓》，专门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并介绍南方红军的革命斗争和华北各省、区革命斗争的情况，以鼓舞广大青年的革命斗志，唤起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这两种刊物在保定各学校中流

传，发挥着它的战斗作用。育德中学、清苑师范、烈士田中学等相继暴发了反对反动校长和训育主任的学潮。敌人更加紧了对这些刊物和二师革命同学的侦察监视。保属特委为了纪念“广州暴动”，在天华市场举行了一次由工人学生参加的飞行集会。当集会解散后，保定公安局便衣侦查队跟踪几个学生到了二师，同学们没有发现敌人的跟踪，就各回自己的宿舍了。便衣特务把宿舍的编号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马上通知张陈卿，要他调查出这几个学生的姓名，由学校挂牌开除，并交公安局法办。张陈卿找到张渭滨要他查清这个斋号（学生宿舍的编号）。正在这时，二师南斋的走廊里和北斋的楼道里又出现了“打倒张陈卿”的标语。张陈卿和张渭滨为了侦察出参加集会和写标语的人，把全体同学的作文本和笔记本搜集去查对字体。经过他们的胡乱猜疑，最后断定写标语和参加集会的同学是高培德和刘德恒。实际打倒张陈卿的标语是我和卢勤良同志写的，但反动的张陈卿和张渭滨竟然把高培德和刘德恒同学开除了。同学们为了反对开除这两个同学，由学生会主席严恒泰向张陈卿提出了抗议，反对他们毫无真凭实据就开除学生。张陈卿恼羞成怒，不但坚持开除这两个同学，还要把他们送交公安局法办。二师的我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两个同学，连夜派人把他们护送回家，等敌人到校抓捕这两个同学时，早已没有他们的踪影了。此后学校又开除了高年级的项志诚和石开福同学。

临放寒假前，张陈卿决定把我开除，他和张渭滨把我叫到办公室，气势汹汹地说：“学校已调查清楚，《曙前》月刊是你主办的，这是非法刊物，你在学校宣传共产主义，不好

好读书，这是不能容许的，从现在起勒令你退出学校，下学期开学不许你再来报到！”张渭滨也接着说：“共产主义根本不合中国国情，什么马克思主义牛克思主义，统统是邪说谬论，象你这种反对三民主义的学生，不配在这儿念书。”我听完之后说：“《曙前》月刊是文艺刊物，是在公安局备了案的，不能停办。你们开除我是没道理的！”张陈卿和张渭滨冷笑着说：“公安局已经决定禁止《曙前》出版！而且还要对主办这种刊物的法办，我们勒令你退出学校还是对你从轻处理呢。你继续无理抗拒，公安局自有另外措施！”我听后知道和这些反动家伙们没什么道理可讲，而且他们随时可能采取毒辣的手段对我进行迫害。于是，我再也没和他们争论，就回宿舍去了。我把这个情况向保属团特委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团特委决定向省委报告，把我担任的工作交给其他同志，并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北平团市委。

此后，张陈卿在保定二师更是变本加厉地迫害革命学生。秘密刊物《破晓》也不能再发行了，因为敌人搜查了我们秘密印刷《破晓》的那个协生印刷厂，同时又开除了好几名同学，而且国民党在第二师范设立了区分部，把他们的狗腿子分布在各班监视同学们的活动，我们的工作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因此，保定党组织决定：赶走张陈卿。

赶走张陈卿的时间选择在一九三一年放暑假的时候。这时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陈宝泉被张见庵代替，新厅长上任，正要改换门庭，这是我们提出撤换张陈卿的好机会。

一九三一年夏，暑假考试已结束了，毕业班结业仪式也在礼堂举行过了，翌日同学们就可以离校了。二师党组织的负责

同志程远绪、葛永胜、严恒泰领导了这次驱逐张陈卿的斗争。就在这天晚上，毕业的同学要求张陈卿和张渭滨举行夜间联欢会。师生们欢聚一堂，向这期毕业的同学祝贺。当然，同学们在会上都装作吹捧张陈卿的样子，用歌功颂德式的语言哄骗他和张渭滨。同学们在图书馆大厅里又唱歌又跳舞，还预备了酒菜点心，播放明星唱片。一直热闹地拖到夜十二点以后。在这“热闹”的同时，安排一些同学把“打倒张陈卿”的标语和“驱逐张陈卿”的宣言贴满了全校。张陈卿本来每夜是要回保定城内公馆睡觉的，但拖到十二点，城门关了，他和张渭滨等人只好睡在学校里。

同学们在程远绪、葛永胜和严恒泰的领导下，把张陈卿、张渭滨的卧室包围起来，在校内外设置了岗哨，又把通向外边的电话线割断。

天到黎明，同学们把张陈卿从梦中叫醒，告诉他全校学生开始罢课，要求他立刻辞职。他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往门外跑，但被人们紧紧围住了。这时校园内“打倒张陈卿”、“打倒张陈卿的走狗张渭滨”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他探头往窗外一看，墙壁上、大树上都贴满了标语。他抓起电话吼叫了半天，电话机里连一丝回音也没有。这时他才知道中计了。于是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地坐在他的椅子上。

我们派到河北省教育厅的代表控诉了张陈卿贪污公款、无故开除学生、压制学生自由的罪行。新换的厅长张见庵要利用这种行动来排斥异己，安插亲信，所以终于答复学生代表同意撤换张陈卿，并委任张云鹤为第二师范的新校长。

当学生代表从天津返回二师时，校园内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张渭滨的一个走卒逃跑了。这个走卒是训育课的张碧川课员，他趁看守他的同学没注意，爬上了紧靠厕所的墙头，当魏铭让同学去抓他时，他扑通一声从墙上跳了下去。墙外是保定的护城河，他一滚就滚到了河里。从河里爬上去就跑向公安局去报告。其他同学们听到魏铭让的呼喊，闻声赶来，可是那个家伙已经跑得没影了。

公安局听这个课员说了情况，派一名警官带着几十个军警赶来二师。正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去天津到省教育厅请愿的代表赶回来了，他们向全体同学报告了教育厅同意撤换张陈卿改任张云鹤为二师校长的消息。同学们一齐高呼：“张陈卿、张渭滨滚出去！”公安局的那个警官也没了主意，只好跟耷拉着脑袋的张陈卿、张渭滨一块走出了学校。张陈卿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终于在同学们的口号声中下了台。

战斗在北平

一九三一年初，党组织把我调到北平。我的工作是北平民国大学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兼任北平西城区政治交通。我的直接上级是西城区委书记董同志，当时都叫他小董。

在北平，先是住在曾在保定二师担任国文课的周永言老师家里。周老师是北京市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对我十分关心。我初到北平，没有一个职业作掩护是不能进行党的工作的，周老师建议我找个学校住。这时，民国大学正招插班

生，我担任民大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在这里出进，如不在学校里挂个名字，出进就不方便，为此，我就准备报考民大中国文学系的插班生。可是，我在保定二师没有毕业，没有毕业文凭不能报考，特别又是报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插班生，还得要一张大学一年级肄业证明书，方可报考。这在当时的确也是一个难题。我向周永言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周老师说：“我去找党组织想想办法。”过了几天，周老师告诉我：“你去旧刑部街五号，找关四小姐，她会给你搞到一张大学肄业的证明书。你见到关四小姐就说我叫你去的，她会关照你的。”

我找到关四小姐，一见面就使我非常惊奇。关四小姐住在一个很宽绰的四合院里，有传达人员，有女佣人。关四小姐穿着一件花缎旗袍，上身还披了一件桃红色的毛衣，脚上穿一双银白色的高跟鞋，抹着口红，两耳戴着金光闪烁的耳环。她看我去了，忙给我让座，叫女佣人给我倒茶。

女佣人把茶送到我手中，说：“少爷请用茶。”这未曾听过的称呼，把我的脸都羞红了。

我向关四小姐说明了来意，她笑了笑说：“这个容易，你是考文科还是考理科？”我说考中文系一年级插班生。她立刻到内套间取出一张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系一年级肄业证明书，上面有端端正正的武汉大学的校印，校印下边有武汉大校长王星洪的签名，并盖有王星洪的手章。她笑盈盈地把这张证明书递给我，我连忙双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她客气地对我说：“这没什么谢的，你是周先生介绍来的，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她一边说一边又给我斟茶水。我又

说了几声“谢谢”，就忙着告辞了。

我在这张肄业证明书上填好我的名字，就到民国大学报了名，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成为民国大学中文系本科一年级的学生。这样，我在民大出入就更方便了。

考入民大后，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就迁居到小莎果胡同，和原先在二师担任过音乐教员的郑南子先生住在一起。他是同情革命的，但不是共产党员。郑先生的姐姐郑咏涛是北平市左联成员，郑咏涛的丈夫刘尊琪是一个记者。我住在他们家里，生活上和工作上都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为了纪念“三八”这个纪念日，党组织秘密通知一些党团员到西什库一个教堂去开会。我负责通知民大、师大、中大、志成中学、宏达学院等学校的同志们去教堂做礼拜，实际上是利用做礼拜来开“三八”纪念大会。

到了开会的时间，西什库教堂内坐满了一屋子人，教堂的神甫看到信徒们这样多，十分高兴。到了九点左右的时间，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传教士登上了讲台，摇铃开会。说：“圣主耶稣为了众生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当他说到这里，忽从人群中站起一位女人来，她跳上讲台，用手一推传教士说：“你让一让，我们先开个会。”那位传教士，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毫无提防，不知所措，被挤到一边直直地发愣。这时，台下响起了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我随着掌声仔细向台上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推开传教士的那人正是关四小姐。她已改了装束——穿着一身朴素的学生服。

她手中举着纪念“三八”的红旗，向大家讲道：“同志

们！我们今天召开一个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为了妇女的解放，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倒蒋介石！”她的话音刚落，便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随即大家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伴着口号声撒开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传单，传单象雪片一样在屋子上空飞舞。接着，关四小姐走在前面，带领队伍冲出教堂，到西安门大街去游行示威了。我也站在了队伍前列，和关四小姐并肩前进。关四小姐笑着向我点点头，我心中明白了，她原来不是什么阔家小姐，而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的几天，我的工作开始紧张起来，要把纪念“五一”的宣传品，都从椿树胡同的地下印刷机关拿出来，分送到我联络的各个点上去。这时，为了避免敌人对我的跟踪，我又搬了家，住进了粉子胡同的华兴公寓。同我住在一起的是我同县的两个老乡，他们是国民党员。为了利用他们的身份掩护我的行动，我注意在与他们交往中做到“友好”，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我的政治面目。我每天早出晚归，他们有时问我怎么这么忙，我就说是去看朋友，或说到剧场去看戏。但是华兴公寓的店伙是接受了公安局监视公寓住客的任务的，每当我夜间回寓较晚时，他们总是用奇异的眼光瞅我，并带点警告的口气说：“先生回来太晚啦！外边可不太平啊，加点小心啊！”我神色自若地回敬他们一句：“听听戏没什么事。”但这已经引起了我的警惕。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出去送文件。当到大木仓胡同的中大去找支部的老赵同志时，恰巧他不在家，门锁着，我正